

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董德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方针和行动纲领，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就要求全党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按照新要求制定

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科学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是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分析国际国内大势，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也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切实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在实践上不断创新，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能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母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切实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在实践上不断创新，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伟大梦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人口约占人类五分之一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无先例可循。同既有一些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要在我国发

展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政策举措、工作部署中得到体现，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努力。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科学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点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但却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重点抓住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新的特点。党的二十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

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从革命战争年代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改革开放时期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的“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适应不同时代所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历史任务，把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坚强保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强调“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适应不同时代所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历史任务，把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坚强保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强调“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适应不同时代所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历史任务，把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坚强保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强调“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适应不同时代所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历史任务，把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坚强保证。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深刻认识城市发展的空间类聚机制

■邓智团

认识和把握空间类聚机制，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底层机制，有效发挥品质城市 and 品质场所吸引优质市场主体的关键作用，有助于城市在遭遇外部冲击后迅速找到恢复路径，推动城市持续繁荣。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和社会多元化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知识密集型经济成为经济繁荣的核心动能。城市，特别是一些特定场所空间借助城市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的组织单位，也成为吸引人才、实现人才和岗位匹配、激发创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平台。虽然在信息技术和交通等“时空压缩”技术变革驱使下，空间障碍不断缩小，甚至有“世界是平的”之说，但空间类聚机制的存在，人才和企业对空间差异却更加敏感，城市发展分化愈发凸显。认识和把握空间类聚机制，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底层机制，有效发挥品质城市 and 品质场所吸引优质市场主体的关键作用，有助于城市在遭遇外部冲击后迅速找到恢复路径，推动城市持续繁荣。

从城市发展的底层机制认识城市分化

21世纪以来，经济分化成为理论热点，宏观层面有2000年彭慕兰《大分流》关注了国家间的发展分化，微观层面有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关注财富分配分化。对世界经济的大分流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讨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背后的形成机制也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的基本理论共识是，自亚当·斯密以来，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虽也存在一定程度不平等，但总体上都还处于最低生活水平；工业革命则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却因工业革

命在国家间影响的不同，在宏观上几乎直接造成了国家间的“大分流”，在微观上间接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平等”。事实上，中观层面的城市分化也十分明显，深刻认识城市分化的客观性和背后机制，以推动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城市发展的底层机制来看，大致包含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空间类聚等三大机制。区位优势回答了城市在哪里兴起，集聚经济解释了城市为什么兴起，空间类聚则为城市分化找到合理答案。区位优势主要关注了城市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区位以及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空间差异。如交通、技术和政策的区位优势发生变化时，也会对城市的繁荣和衰退产生明显作用。集聚经济解释了在“平坦的世界”中为什么会有“高耸的城市”，也即经济活动为什么会有空间集聚，城市为什么兴起。城市经济理论认为，集聚经济源自经济活动集聚过程中存在的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源自可交易性的相互依赖，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接近大规模市场等，而地方化经济则源自非可交易的相互依赖，如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储备、专业服务和隐性知识等。而复杂经济学则从城市具有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网络结构，解释了为什么集聚能提升经济效率。正如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中的观点，集聚提升城市生产率的原因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等各种网络，让进入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得以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

空间类聚机制则回答了城市为什么会分化。空间类聚机制表明，市场经济中的异质主体会做出不同的区位选择，优质主体会源源不断向高生产率地区集聚，低生产率主体会被淘汰出高生产率地方，具体包含空间群分和空间选择两种机制。空间群分机制类似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优秀人才和优质企业倾向于生产率高和竞争力激烈的城市；而空间选择机制则表明生产率高和竞争力激烈的城市会淘汰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人才和企业。空间群分是一种事前选择机制，反映了异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空间选择是事后机制，反映了空间对异质主体的筛选机制，体现异质主体空间

区位的被动性。

从底层逻辑来看，空间群分和空间选择的本质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表明不同技能水平和不同生产水平异质主体在空间区位上的理性选择结果，会在人才、企业与城市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匹配性，自然导致区位选择的空间差异。在空间群分作用和空间选择构成的空间类聚机制作用下，必然出现城市发展分化。就全球层面而言，全球城市网络仍然表现出功能上的等级性，纽约、伦敦和东京所拥有的以面向世界、服务全球为特点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几乎控制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特别是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业等行业顶级企业都分布在这些顶级全球城市，让世界城市格局在短期内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从长期来看仍变动不居。

利用空间类聚机制推动城市持续繁荣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发展逻辑下，城市兴衰、空间分化更多取决于人才、企业以及相关经济活动的集聚规模和质量，在空间类聚机制作用下，空间品质在吸引优质经济主体中作用巨大。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市场型政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遭遇外部冲击后，要想方设法打造更高品质的城市与场所，在强化传统的基础设施和财税优惠等“地基”政策的同时，全力做好新型的吸引和留住劳动力的“人本”政策，恢复城市繁荣的持续动力。

一是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更好地吸引和留住国内外的优质主体。对致力于在全球层面代表中国参与竞争的城市而言，要着力吸引和集聚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及功能机构或公司，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以期赢得全球层面城市竞争。正如丝奇雅·萨森在《世界经济中的城市》(2020)的观点，当前全球城市功能载体源自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以面向全球市场提供服务的专业服务和总部经济等为主，这些特定产业综合体的运行得益于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人才、企业和组织机构。因此，参与全球竞争

的城市，就需要具有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以吸引和集聚国内外顶级的人才、企业和机构，进而培育和形成全球城市特定产业综合体，赢得全球层面的城市竞争。

二是以场景城市建设和品质场所营造提升生活空间，全面增强城市吸引力和社会包容度。城市的本质是“人”。理查德·佛罗里达在《新城市危机》中直言，“只有以人为本、基于地点的新型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关键是要建造一些小型城市设施让城市变得更宜居”。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服务业在城市产业结构占比的快速提升，以创新和创意为主的“创新阶层的崛起”逐步成为城市就业主力军，推动城市向创新和创意转变。而创新阶层对雅各布斯城市多样性和卡尔索普新城市主义的偏好，推动以场所品质为主的场景城市建设主导了城市更新发展。因此，各城市需要以有机更新为抓手，持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城市硬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城市生态、城市治理等软环境，以增强城市对优秀人才和优质企业的吸引力。特别地，要注重品质场所营造，从强调功能分区转向功能混合，大力打造5分钟生活圈和15分钟工作圈的“微型城市”，着力打造城市内部节点和活力街区空间。

三是适当放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要素约束，提升城市承载力和增长潜力。确保低生产率地区“流得出”的要素，在高生产率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留得住”。要充分发挥我国城市的特色优势，在城乡一体化战略下实施中心城区和郊区的“一城两策”，强化中心城区的全球高端要素承载能力，适当放宽郊区人口、土地和能耗等发展约束条件，提升郊区新城独立节点功能和综合发展水平。积极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要素畅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等互联互通，着力推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不断增强和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和综合竞争力，推进中心城市和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致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空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讲清楚中国人的天下观

■陈方刘 朱双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胸怀天下”总结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天下观，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地理上的“天下无外”。中国先民以中原为中心，把东南西北人迹所至之处都视为天下的范围。《中庸》说天下的范围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这是一个中心相对清楚，而边界却相对模糊的地理范围，具有“天下无外”的显著特点。也可以说，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中国先民的“世界观”。天下在古代也被称为“四海”，《尚书》理解当时的“天下”是：“东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诗经》也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为了实现地理上的“天下无外”，必须保持领土完整。这样，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就成为民族大义，逐渐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政治上的“天下一统”。所谓“逐鹿中原，争夺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说的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天下。古代的中国又被称作“九州”，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历来是中华民族对政治上实现“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景。当然，中国人天下观中的“天下一统”是多元一统，尊重各民族的独立性，即是指在维护“天下一统”的前提下，并不破坏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治理传统。正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天下一统”，中央必须要有权威，以确保政令畅通。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大一统”是第一“大义”。孔子对管仲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的功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也认为天下应该“定于一”。在中国历史上，“天下一统”时，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反之，容易由战乱频繁而导致民不聊生，因此，大一统包含着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愿景。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在当代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理念上的“天下一家”。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倡议：“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胸怀天下”的情怀，很早就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大学》把“平天下”理解为“明明德”。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子认为“以天观天下”，在国与国交往中大国应该取“谦下”的态度。在中华文明史上，协和万邦的理念一脉相承，集中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中华民族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各族人民都过得好，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不仅没有导致“文明的冲突”，而且对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人的天下观，对于凝聚共识，一起向未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